

史学研究方法对翻译史研究的阐释作用

穆雷¹ 欧阳东峰²

(1.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高级翻译学院, 广东 广州 510420

2. 广东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 香港中文大学 翻译研究中心)

提 要: 翻译史研究是对翻译历史活动的记述与研究, 归属于翻译学研究和历史学研究的跨学科领域。本文试图厘清目前历史学研究方法的主要概念和基本体系, 以及适用于历史学的各类方法, 在梳理翻译史研究文献的基础上, 介绍翻译史研究的发展概况和研究现状, 从方法论的角度评价历史学研究方法在翻译学研究上的优势和局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 翻译史研究; 研究方法; 历史学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15)03-0115-08

On Research Methods of Historical Science in Translation History

MU Lei OUYANG Dongfeng

Abstract: Translation history, which belongs to both historical science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s the historical recording and research of translators, institutions, thoughts, works and movements, etc..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aborate the basic concepts and systems of historical science and discusses how and to what extent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can be applied to translation history. By the critical assessment of the present application, the methodological investigation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the findings of the contribution and limitation.

Key words: translation history research; research methods; historical science

1. 引言

构建中的翻译学科需要翻译理论、翻译史和翻译批评三大支撑, 而翻译史被看作是权力转向后翻译研究最关注的内容之一(张旭, 2010: 28-31)。翻译史研究有不同的描写对象和叙述结构, 如翻译家、翻译机构、翻译思想、翻译理论、翻译作品、翻译运动等。采用何种研究方法是翻译史研究的一个要点, 关系到翻译史研究进展是否顺利, 成果是否站得住脚, 研究者是否能够与本领域和相关领域的学者顺利对话。翻译史研究具有向史学研究借鉴方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这缘于两者在学科性质上存在共通之处: 翻译是科学抑或艺术, 从西塞罗(Cicero)、德莱顿(Dryden)直至今日, 尚无定论; 而人类历史不仅受自然律支配, 还贯穿着人文动机(何兆武, 1998: 5-16)。由此可见, 这两门学科既具有物质性客观化的一面, 又都带有浓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色彩。从一方面来说, 如果任何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史都是史学研究的一个方面的话, 那么, 翻译史就是史学研究一个小小的分支; 从另一

方面来说, 任何一个学科的学科史, 都与史学研究有着类似的研究目的和作用。因此, 翻译史研究应该也必须借鉴史学研究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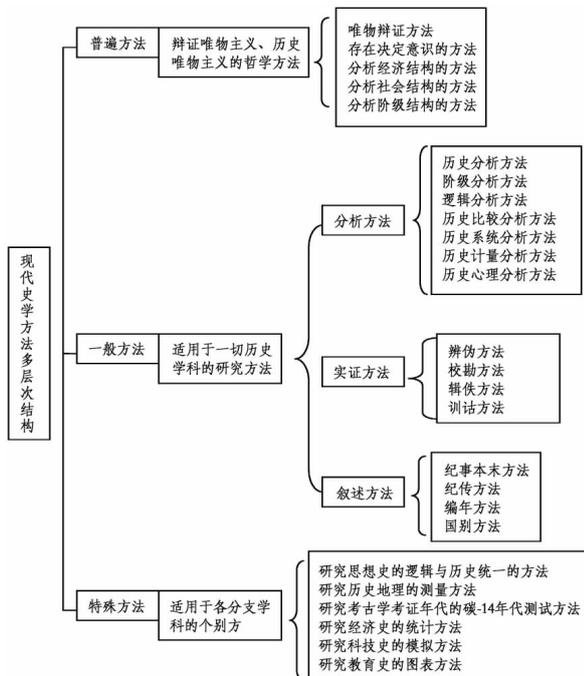
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 2002: 3)在《翻译研究》一书中强调翻译的自主性, 认为翻译研究能够从其他学科借用技巧和方法, 也能够向其他学科提供技巧和方法。可见, 翻译学研究可以谨慎并恰当地引进其他相关学科的概念、理论、方法和工具, 拓展研究方法, 满足本学科对象的社会形态多样性的需求。翻译研究起步较晚, 相对而言, 史学研究是比较成熟的学科, 翻译史研究方法的跨学科化这一趋势, 既具备人文社会学科互通共生的特点, 也符合翻译学研究本身发展的需要。

历史学研究方法是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工具, 它是在认识历史和研究历史的过程中, 搜集、整理、运用、分析和提炼历史事实, 以实现一定认识和研究目的、探寻历史规律、解决研究问题的方法。^①西方

^① 该定义由笔者在综合赵吉惠(1987: 8)和马卫东(2009: 112)观点的基础上形成。

近代史学始于文艺复兴,19 世纪成为专门学科,以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是当时的主流,由于它过分强调考证和叙述,不提及哲学论证和史学功能,于 20 世纪下半叶被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综合主义史学代替,自此,代表旧史学的德国兰克史学和代表新史学的法国年鉴学派成为近两个世纪来西方史学发展的主要潮流。(韩寿根等,1989:255)

在中国史学史上,从司马迁的通史性纪传体、班固的断代性纪传体,到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据法,均以实证考据为特点。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引进了以 20 世纪西方史学思想和分析方法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史学观,被视为中国近代第一部吸收西方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和方法论的中国史学方法著述,是新史学思想的奠基之作。此后,讲究史学方法成为 20 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特点之一,史学研究方法也随着研究本身的层次和角度变得丰富多样。



历史学研究方法体系一览表①

史学研究方法体系根据性质、作用、要素和适用范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普遍方法、一般方法和特殊方法。史学研究的普遍方法指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因其适用于研究普遍社会现象,并反映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及其发展趋势

势而得名,它对一般方法起指导作用;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指广泛适用于一切历史学科领域的研究方法,分为分析方法、实证方法和叙述方法;史学研究的特殊方法指适用于历史科学中各专门史的个别方法。一般方法处于中间层面,因此既受上一层普遍方法的制约,又指导下一层的特殊方法,成为讨论的中心,具体结构如下图所示:

其中,历史学一般方法的分类因其操作性和普遍性较强,成为本文讨论翻译史研究方法的主要参照依据,下文将着重介绍。

2. 翻译史的研究现状及其历史学方法之鉴

翻译史研究形成的学术著作既有专论,也有通论,既有断代史,也有专题史、人物史和地域史,等等。近年来翻译史学术论著数量逐年上升,从 1949 - 2014 年,在中国两岸四地有据可考的翻译史研究著作累计达 181 部。据文军统计显示,翻译史和译家研究在通史、断代史和专题史方面均有完整著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形成了以点带面的立体研究网络,同时他也提到翻译史在国外翻译史、少数民族翻译史和口译研究史上的不足(文军,2010:33-37)。

1949 年以来第一篇有关翻译史的文章刊登于《翻译通报》1950 年第 10 期,题为“论鲁迅的翻译”,作者胡仲持(文军,2006:3)。此后,翻译史研究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和科研项目数量逐渐增多。在 1949 - 2014 年的 65 年里,翻译史期刊论文(以 15 种外语类核心期刊^②为统计源)总数约一千篇。在 1993 - 2014 年中国两岸四地高校 800 篇翻译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翻译史研究论文数量最多,达 266 篇,占总量的 33.3%,大致可分为作品译介/传播/影响与接受史研究、翻译家/历史上的译者研究、翻译与语言/文化/文学/社会/科学发展史研究等 11 个类别(在穆雷、邹兵,2014:15-16 基础上增补)。截止到 2014 年国家社科基金(1993 - 2014)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及哲学社科基金(2004 - 2014)的翻译研究立项里,翻译史及译介学研究比重都比较大,分别达 116 项和 89 项,各占 37% 和

① 笔者根据赵吉惠(1987:12)表改绘而成。

② 这 15 种外语类核心期刊请参见(许钧、穆雷,2009b:81)。

25%左右。这表明:有众多学者在关注和从事着翻译史研究,并产生了许多学术成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成为霍尔姆斯翻译研究图谱的重要补充。除了学术论著、期刊论文和基金立项之外,专门探讨翻译史研究的学术会议陆续召开,如第一、二届中国翻译史高层论坛先后于2012年和2014年在四川大学和华东政法大学召开,学者们集思广益,交流思想,就议题选择、分析角度、史料挖掘、方法架构等展开了积极探讨,产生了良好的学科认同和社会反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成为翻译史研究的学术重镇,该中心为培养青年翻译史研究者,于2004年起,隔年举办“书写中国翻译史:中国译学新芽研讨会”,已举办过六届;于2009年起,隔年与内地高校合作举办“阅读中国翻译史:中国翻译史研究暑期班”,已举办过三届,合作过的高校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2011年创办年刊《翻译史研究》,是现今唯一登载翻译史研究专题论文的刊物,由复旦大学出版;此外每年举办一次与翻译史有关的国际研讨会,如今年的议题是“中国翻译史进程中的译者”,这些对推动翻译史研究和培育青年学者起到重要作用。

在收获翻译史研究成果的同时,学界也在不断反思翻译史研究特别是研究方法中出现的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如需要深入翻译史研究并改进研究方法,重新审视中国两千年的翻译史等(林克难,1998:9-11);翻译史研究不仅要抢救翻译史料,还要结合文化史思想史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穆雷,2000:44-48);文学翻译史虽然历史近百年,成果不断,但对翻译史研究方法的探讨却不够深入(夏天,2012:80-87)。在1949-2014年181部国内翻译史专著里,史料的搜集细致入微,翻译史研究方法的专著却寥寥无几,这些情况都反映了对翻译史研究方法探索不足的现状及其必要性。

进入新世纪,学科发展趋于整体化和精细化,学科之间依赖性普遍增强,因此,翻译学也需要吸收和运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工具和方法。在研究翻译史时,要区分“史实”和“史识”,前者为历史事实,后者为对历史的认识。治史者须具备问题意识和历史眼光,钩沉与鉴别历史材料,思考与推导研

究问题,解释并寻找翻译现象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之间的联系,切忌将翻译史做成只停留在史料表面的罗列和堆砌。邹振环建议翻译史的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宜互相结合,在全面的描述上进行有意义的阐释,以多角度多形态的研究方法为上,从内部理论走向外部空间,方是翻译史未来的研究方向(邹振环,2010:18-26,32)。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下文将按照历史学一般方法中的分析方法、实证方法和叙述方法,系统地展示翻译史研究中史学方法的运用。

2.1 翻译史研究中的分析方法

历史学中的分析方法有历史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和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在学科分类上既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也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结合。

2.1.1 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分析方法

历史分析方法建立在搜集、整理、考证、分析、提炼史料等一系列过程中,进行有效和有意义的分析(Elizabeth Ann Danto,2008:59)。这一方法被视为翻译史研究中的基本方法,它把有关的翻译作品、译者、翻译理论、翻译活动、翻译机构、翻译流派等置于历史的特定情境中进行研究,研究目的不是流水账式的简单记录,而是通过寻找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与发展脉络,揭示其产生根源、呈现特征和本质规律,从而帮助人们深刻理解翻译现象与翻译活动的发展历程。

如在《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里,作者采用了史学研究中的科学实证方法,钩沉史料,描述出朱湘的翻译作品细目,但这并不是单纯的材料罗列,而是将其置于特定时间和特定条件下的历史分析,在材料相互矛盾或线索中断的情况下,运用现象学中“悬搁”的方法,找出符合历史情况的力证,在“回归文本”的同时,照顾历史语境,做到微观考察和宏观关照相结合,在客观描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采取批判的态度,探讨朱译规律,推翻前人结论(张旭,2008)。这种历史分析方法能帮助研究者从历史角度考察问题,关注事件发生的背景信息,以及在特定时期内产生的历时变化,揭示了语言、翻译与历史、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2.1.2 翻译史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是根据阶级斗争、阶级关系、社会阶层、社会结构来观察事物或揭示研究对象的特点(Martha Howell & Walter Prevenier, 2001: 94)。这种分析方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在考察阶级性的社会问题时有较大作用,但因时代发展,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不再成为唯一权威的实质性方法,如在评价某一位译者时,不光可以从他的阶级地位、阶级关系、政治立场,还可以从历史事实、文化价值传递、产生的实际效果等入手,分析才会更全面。丁则良1951年著《李提摩太——一个典型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传教士》,从书名即可观察到阶级分析取向,李提摩太在华45年,翻译了政治、历史、宗教、文学等方面的文本,虽然在客观上产生过一定影响,但受历史所制,作者将其归属为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文化帮凶。

在我国特定的历史阶段里,翻译史研究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俄苏、亚非拉文学作品的介绍占据了主要位置,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对俄苏的文学翻译研究也陷入停顿,之后才慢慢解冻复苏,那段时间的翻译史研究方法以阶级分析方法最为常见。

阶级分析方法在我国特定的历史年代成为主流,可见学术研究方法与当时整个国家的政治路线和党性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该问题,一方面学术不可泛政治化标签化,政治思维的话语空间有可能会影响独立思考;另一方面也要考虑研究对象与阶级环境的关系,特别是要正确认识和对与研究对象有密切关系的特殊历史事实和客观存在。

2.1.3 翻译史研究中的逻辑分析方法

史学研究中的逻辑分析方法指运用形式逻辑中的归纳、演绎、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来认识和研究历史的方法(赵吉惠,1987:103)。较之历史分析方法而言,它更强调抽象性、概括性和逻辑推理的过程,尤其在历史出现跳跃、倒退、曲折或偶发情况时,通过对历史概念的认识和历史现象的判断,提取事物的规律和核心本质,此处以归纳和演绎为例说明。

归纳是从许多个别的历史事实材料中总结出特点和联系,得出其本质的方法。杜维运认为归纳当属第一种必须使用的治史方法,称为方法中的方法(杜维运,2006:46-63)。这种方法适于从微观的

个体分析总结出宏观的历史结论,研究者尽可能搜集所有的原始资料,讲求证据充分,结论审慎,孤证不结论。如《20世纪中国翻译史》(方华文,2005)通过归纳考察符合条件的个体,进行了大量的文献补白工作,在时间上接续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按清末民初、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三个阶段分期,梳理了译品、译者和译论,通过丰富的史料梳理,归纳整理出各个阶段的特点,呈现出翻译活动的线索和轮廓。

演绎的过程与归纳相反,是从一般的原则运用到具体事例的研究方法,即先建立原始前提,再寻求事实,多用于个案或局部的历史问题研究。如“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理论对汉诗英译的解释力——以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词英译为例”就采用了勒菲弗尔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对比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的两个英译本(徐静,2009:431-434)。文章先建立理论假设,再由假设导致观察,从一般推导至个别,进而证实论点。

2.1.4 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比较分析方法

历史比较分析方法19世纪盛行于西方,按研究的时间和角度分为历时比较、共时比较、宏观比较和微观比较。历时比较研究指对发生在不同时期的同类现象的比较;共时比较研究指处在同一社会发展层面的所有要素的比较;宏观比较研究指从系统认识和整体概括的角度看待历史;微观比较研究指对个别历史现象的具体、特定研究。有历史学家提出历史比较分析方法更侧重于研究不同时空中的社会差别(Harry Ritter,1986:58)。在翻译史研究里,不同时期的史学现象或者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由于具备同样或相似的特性,产生相互比较的基础,研究者可从中发现异同、探寻规律。

如“歌德笔下的‘中国女诗人’”以1827年歌德从《百美新咏》英文转译的两首中国诗为研究对象,对中英德三文本进行对比研究,文章用历时和微观的比较研究方法,结合歌德的文化适应说,指出译文的增删之处旨在让目标文本传达必要的文化信息和美学信息,印证了歌德的翻译“三类型说”——注重简洁文体、粗略模仿和原译文意境一致,同时也阐发了歌德的以女性精神为重点的“世界文学”概念(谭渊,2009:33-38)。这篇文章考察了女性形象在不同时段译本里的体现,研究者并没

有孤立于某一个时间点,而是穿行在纵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进行比较分析,考察问题的发展和变迁,寻求翻译史发展的脉络和趋势。

采用历史比较分析方法,能够加深对历史的认识,较好地克服研究中的片面性,同时需要注意如下几点:一是事物之间要具备可比性;二是要有比较层面的研究价值;三是可与其他史学方法互相借用,提高精度和信度;四是需要研究者有较强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遵照这四点,才能如严耕望所言“看人人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未说过的话”(严耕望 2008: 21)。

2.1.5 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系统分析方法

历史系统分析方法运用了现代系统论原理,视社会和历史为一有机的整体结构,历史的发展就是一个整体系统的演变(马卫东 2009: 153)。采用历史系统分析方法,可以按照发展的观点,由全局到局部、由表象到本质、由环境到系统、由整体到层次,揭示社会系统与外在环境的互动、社会系统内部各要素的辩证关系以及历史运动趋势。在翻译史研究中,翻译的历史活动由若干要素构成,由于构成的方式各异,导致结构和层次各不相同,研究者宜从整体观念出发,把翻译史视为一个内部有层次有结构、外部与环境发生交换关系的活动。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任淑坤, 2009)探析了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发生的起源,并考察了翻译活动与文学系统、思想系统等整体间的联系,认为开启民智与救国图强的意识对传统翻译的转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学翻译与本土文学、思想文化有着互动关系。该书运用了历史系统分析方法放眼全局,探析翻译活动的内部和翻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结构、整体、局部和要素之间的关联。这种视角上的革新与孤立分割、机械处理事物是完全不同的。

2.1.6 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计量分析方法

大量史料的出现需要研究方法的革新和信息效率的提高,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得益于数学方法、统计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广泛渗入,它运用数学语言,描述历史现象,通过收集、整理数据,抽取参数和变量,揭示历史发展中数学化的特点,探讨研究对象的关系、变化和过程(Konrad H. Jaraus & Kenneth A. Hardy, 1991: 2)。传统翻译

史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历史计量研究方法突破传统研究中的单纯描述和罗列,利用统计数据、图表、数理模型、线图与矩阵、概率、随机变量、趋势计算、相关和回归分析等反映历史过程中复杂的数量关系,揭示质上的性质与特点,使研究结果更令人信服。

例如“2001 - 2006 年国内翻译研究的计量分析——基于 3 种翻译研究核心期刊的词频统计”采用词频统计法,以 2001 - 2006 年《中国翻译》、《中国科技翻译》和《上海翻译》发表的 1600 多篇论文为来源,分析出近年来国内翻译研究的高频词、频次呈增加和减少趋势的关键词,进而总结出界内热点、动向、特征和趋势(袁良平、汤建民, 2007: 19 - 22)。研究建立在大量的数据之上,对考察国内翻译研究的发展现状有着积极作用。历史计量分析方法在翻译史研究中的运用渐热,虽然该例只用到了词频统计和图例展示的方式,但已是成功尝试。

2.1.7 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心理分析方法

所有的翻译史事件都与人类活动有关,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引入了心理学的成果。历史心理分析方法可以针对性地分析个体或群体的心理活动及气质表象,讨论产生的社会因素和群体关系,科学地解释研究对象的行为及其与历史的联系(E. Sreedharan, 2007: 37 - 39)。由于涉及社会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疾病学派、民族心理学、集体心理学等学派,心理分析方法对翻译史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要求较高,在目前的译学研究中主要用于翻译过程、认知心理、文化接受等方面,在翻译史研究中尚不多见。

宋萍的“政治因素对译者翻译心理的影响”认为译者的翻译心理具有生成性、体验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它不是天生就有,而是通过体验和感受生成,并随着环境产生变化,政治关系作为社会关系中重要的一部分与译者心理关系密切,因此文章分析了政治因素、政治立场和政治倾向是如何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译者翻译动机、选择心理和翻译策略(宋萍, 2010: 88 - 91)。这篇文章虽然探讨译者的心理,但历史心理分析的操作工具和方法运用仍有待加强。

2.2 翻译史研究中的历史学实证方法

与人文社会学科里的调查法、实验法和观察法等实证方法有所不同,历史学研究特有的实证方法

指一系列具备历史学特色的考证方法,如辨伪方法、校勘方法、辑佚方法、训诂方法等。伪书即伪造之书,古人因为政治或经济利益、学派或声名、厚古而薄今等主客观原因全部或部分伪造事实如时间、作者、书名、人名等,辨伪方法需要研究者以唯物主义史观的态度明辨真伪。校勘即校对勘误,今俗称校对,因为古书的流传方式比较原始,难免以讹传讹,因此校勘必不可少,古人称之为校讎。辑佚是借助高明的鉴别能力和审慎的分析能力,从散落的各类史料里找寻有价值的东西,重新编辑成书以恢复原书面貌的方法。训诂方法是鉴于古今的文字在音、形、义上都有较大的差异,为了理解和交流,用现代的语言解释古代的文字。

上述历史学实证方法是翻译史研究者进行文献工作的必备,就辨伪而言,伪经的辨伪研究是我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重要内容,刘敬国和项东考证了一部在中国佛教史上很有地位的汉文佛经——《仁王经》的真伪,并从历史语境出发,通过校勘、辨伪、辑佚等方法进一步分析这部佛经为何被视为伪经,及其经典化的过程(刘敬国、项东,2010:24-27)。上述方法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一般的翻译研究学者需要专门的学习补课,否则难以熟练运用,这也是翻译研究学者的“先天不足”,需要引起自身注意。目前的翻译史研究在这方面最为欠缺,其研究结果很容易受到诟病和质疑。

2.3 翻译史研究中的叙述方法

历史学中常用的叙述方法主要有:纪事本末方法、纪传方法、编年方法、国别方法等,分别以事件、人物、年代和国家为线索编排历史事件。从跨越的历史长度来看,记录了各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的史书被称为通史,如《资治通鉴》;以朝代或特定年代划分为断限的称为断代史,如《汉书》、《明史》等。

翻译史研究按照上述思路和主题有着类似的区分,最常见的有人物史、断代史、专题史、通史和地域史等。在1949-2014年181本国内翻译史专著里,含有58部人物史、18部断代史、54部专题史、39部通史、12部地域史。在专题史中,文学文化类的翻译史专著达39部,约占专题史总量的72%强。

编写者的写作理念是统领材料,推陈出新,带来不同阅读体验的关键。不可否认的是,在24部

翻译通史里,以时间为纬、以人物为经的写作手法比较常见,而以主题为线索的专著实不多见,中西社会发展的阶段相似,中西翻译史前行的道路也有共通之处,如能对照分析不仅可以史为鉴,为中国翻译史的未来提供参照,还可以探寻翻译史自身的进程。

3. 翻译史研究方法中的问题和发展前景

翻译史研究近十年来发展迅速,历时研究、共时研究、断代研究、人物研究、译介研究、专题研究等均有涉及(许钧、穆雷,2009a:199)。但由于缺乏学术共同体、学术交流的载体、系统的理论、大型的基本资料库等,所以翻译史研究并未像思想史、经济史、中外交史、中外关系史那样得到认可。目前我国的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大都侧重于以文献记录为主的史料钩沉和梳理,这和中国早期的历史学和文献学不分家有关。新世纪以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们对翻译研究认识的深入,当前的翻译史研究同样面临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冲击和挑战,研究者开始从不同视角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探索,试图突破翻译史学研究方法长期以来薄弱的现状。史学研究方法从直观描述到批判研究,从笼统疏阔到准确精微,从定性研究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单维研究到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均为翻译史研究方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方法来源。翻译史研究不仅需要钩沉翻译史料,更要透过现象把握翻译活动的本质,解读背后的关系与原因,了解和认识翻译的活动规律,这才是翻译学研究中翻译史研究的目的,这样的研究才有别于历史学研究,真正属于翻译学研究领域。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重史之国,翻译史涉及历史、社会、文化和语境,其复杂性决定了单纯的内部研究是有局限性的,如果只停留在内部,会陷入狭隘的向心式研究,只描述不解释是不妥的,简单的内部史阐释也是不科学的。翻译史研究要打破原有的语言惯性,形成新的学术生长点,就必须科学审视并冷静思考史学研究方法的革新与变迁,有选择性地借鉴各种史学方法,转化为新的话语实践,这才是翻译史研究未来趋向成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翻译史研究方法以历史学研究方法为鉴,而历

史学研究方法又受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滋养,综合而言,目前翻译史研究方法可借鉴两大类学科方法:一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如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二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计量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重在行为的个性特征,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强调事物的共性规律,两种研究方法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它们的结合带来了翻译史研究的新发展。正如勒代雷指出“希望从事研究的两个流派(人文科学派和自然科学派,笔者根据原文添加)、两种方法至少能够和平共处,因为它们实际上是互补的”,“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中间道路,在这条路上,两种流派都抱有开放意识,这条路可以帮助大家充分利用彼此的成果,因为这样做有益于翻译学科的发展和建设”(勒代雷,2010:17)。实际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离不开事实观察、采集数据和技术力量,自然科学研究获得的数据同样需要归纳、比较、综合、分析和解释等逻辑推演的过程,两种研究方法可以相互结合,优势互补,运用的时候产生合力,服务于翻译史研究。

翻译史是随时间更迭,在历史进程中按时间顺序发生的翻译事件,也是遵循历史规律、反映历史发展逻辑和趋势的过程,翻译史发展的动因是文化的碰撞与融合。鉴于此,翻译史研究者需要勾勒轨迹,梳理脉络,认识翻译史的本质和规律,用开放的思路分析文化的消长变化,在广度和深度上钩沉、考辨、评价和分析一手史料,避免采用二三手材料引起的硬伤,而且不能只停留在罗列事实、停留于史实的发现和堆砌,或仅仅局限于几位现代翻译家的研究,而应该以此为基础,联系翻译事件发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提出翻译史学科领域中的研究问题并予以论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重点关注翻译史进程中的译者和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在翻译史的研究材料、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上寻求创新。

翻译史作为翻译研究的学科史,是翻译学科建设的支柱之一,是跨学科跨文化的交叉领域,翻译史研究的健康持续发展是翻译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关注译者,聚焦社会动因,涉及众多学科门类,同时给研究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这主要是由于翻译学专业的学生多为英语专业背景,缺乏历史研究的专业和方法训练,为了更好地研究翻译

史,研究者应增强史学方法意识,加强学科间的对话与合作,用科学的眼光和方法对翻译现象和活动进行考察,避免将翻译史做成资料的堆砌。在考证、辨伪、校勘等钩沉与鉴别史料的前提下,提出研究问题,形成研究假设,通过描写和解释、定性和定量、宏观和微观等路径,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或者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相结合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证实或证伪,研究中有四点值得注意:

(1) 在借鉴历史学研究方法时,应以翻译现象为研究对象,依此提出研究问题和假设;

(2) 历史学研究方法要和翻译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

(3) 各种方法不是相互矛盾的,研究者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条件采取不同的方法,或者综合运用,以期达到最好效果;

(4) 不要盲目地追新求异,在拓展翻译史研究方法时,研究者要结合实际情况,充分了解各种方法的适用范围和利弊。

不同学科为翻译学带来了全新视野和方法,作为一名翻译史研究者,应有清醒的学科意识,翻译学既众声喧哗,也困境重重,“跨学科”有可能模糊翻译的学科身份,悬置翻译研究的本体,而研究翻译史应该以推进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为宗旨,在认识翻译史和史学研究各侧重点的基础上,坚持翻译学科的立场,勿因多学科性导致无学科性,因此翻译学下一步的发展应该做到既合理借鉴,又保持专业的独立性,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翻译学的研究方法,实现学科间的良性对话。正如孙艺风所言,在借用其他学科时要协调不同学科的界面,审视它们如何相关相通,才能在总体上把握翻译学(孙艺风,2010:9)。翻译史研究者应充分利用史学研究方法为己服务,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类学术内部的调整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 [1] Bassnett, S. 2002. *Translation Studies* (3rd edi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2] Elizabeth Ann Danto. *Historical Researc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3] E. Sreedharan. *A Manual of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ology* [M]. Trivandrum: SB Press (P) Ltd., 2007.

- [4] Harry Ritter. *Dictionary of Concepts in History* [M].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6.
- [5] Konrad H. Jarausch & Kenneth A. Hardy. *Quantitative Methods for Historians: A Guide to Research, Data, and Statistics* [M]. North Carolin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 [6] Martha Howell & Walter Prevenier. *From Reliable Sources: An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Methods* [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 [7] 杜维运. 史学方法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方华文. 20世纪中国翻译史 [M].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5.
- [9] 韩寿根, 石振泉, 张美生. 学科大全 [M]. 沈阳: 沈阳出版社, 1989.
- [10] 何兆武. 历史学两重性片论 [J]. 史学理论研究, 1998 (1): 5-16.
- [11] 勒代雷. 论翻译学研究方法 [J]. 刘和平, 译. 中国翻译 2010 (2): 11-18.
- [12] 林克难. 对理论沉寂期的反思 [J]. 中国翻译, 1998 (6): 9-11.
- [13] 刘敬国, 项东. 经典化和政治化——一部汉语佛经的诞生 [J]. 中国翻译, 2010 (4): 24-27.
- [14] 马卫东. 历史学理论与方法 [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15] 穆雷. 重视译史研究, 推动译学发展——中国翻译史研究述评 [J]. 中国翻译 2000 (1): 44-48.
- [16] 穆雷, 邹兵. 中国翻译学研究现状的文献计量分析 (1992-2013) ——对两岸四地近 700 篇博士论文的考察 [J]. 中国翻译 2014 (2): 14-20.
- [17] 任淑坤. 五四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研究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8] 宋萍. 政治因素对译者翻译心理的影响 [J].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7): 88-91.
- [19] 孙艺风. 翻译学的何去何从 [J]. 中国翻译 2010 (2): 5-10.
- [20] 谭渊. 歌德笔下的“中国女诗人” [J]. 中国翻译 2009 (5): 33-38.
- [21] 文军. 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 [M]. 北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6.
- [22] 文军. 建国以来中国翻译理论著作出版评述 [J]. 中国翻译 2010 (1): 33-37.
- [23] 夏天. 史料、语境与理论: 文学翻译史研究方法构建 [J]. 外国语 2012 (4): 80-87.
- [24] 徐静. 勒菲弗尔意识形态理论对汉诗英译的解释力——以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词英译为例 [J]. 辽宁科技大学学报 2009 (4): 431-434.
- [25] 许钧, 穆雷. 中国翻译研究 (1949-2009) (新中国成立 60 周年外语教育发展研究丛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a.
- [26] 许钧, 穆雷. 中国翻译学研究 30 年 (1978-2007) [J]. 外国语, 2009b (1): 77-87.
- [27] 严耕望. 治史三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28] 袁良平, 汤建民. 2001-2006 年国内翻译研究的计量分析——基于三种翻译研究核心期刊的词频统计 [J]. 上海翻译, 2007 (3): 19-22.
- [29] 张旭. 视界的融合——朱湘译诗新探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 [30] 张旭. “权力转向”与自我再现——评《翻译中国》 [J]. 中国翻译 2010 (4): 28-31.
- [31] 赵吉惠. 历史学方法论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
- [32] 邹振环. 晚明至晚清的翻译: 内部史与外部史 [J]. 东方翻译 2010 (4): 18-26, 32.

收稿日期: 2015-01-06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大科研项目 (2014WZDXM018)、广东工业大学校内博士启动基金 (405120144)、广东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研究重点项目;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学研究立项课题重点项目 (GWJYZD14001)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穆雷,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外语研究与语言服务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翻译教学等研究。

欧阳东峰, 女,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博士, 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名誉博士后研究员, 主要从事翻译史和翻译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 赵小刚